对周边外交研究的一些思考

文／吴心伯

三个方面的研究意义

应该讲，周边外交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习近平时代中国周边外交有三个方面的研究意义。第一是具有大战略意义。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六个海上相望国家；再延伸出去，东面是亚太，西面是整个欧亚大陆。也就是说，中国周边的辐射面占了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的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周边外交的布局不只是一个地区战略，更不仅仅是一个周边战略，而是一个真正的大战略。所以我们的周边外交是大周边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的外交布局和世界格局的一个基本战略思考和取向。

第二是具有体现中国外交自主性的意义。长期以来，对美外交是中国外交重中之重，但今天中国的实力和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的外交也越来越以我为主，首先就要考虑周边的布局和经营。中国不结盟，但不意味着不需要伙伴，这些伙伴最主要的就是周边国家。

第三是具有理解中国崛起的指向性意义。从中国的周边外交，就会看出中国今后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国，是成为一个传统的大国，还是成为一个新型大国，或是一个半新半旧的大国？从我们对周边的思维、举措、布局，大致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周边有许多小国、弱国、欠发达国家，怎样对待它们，可以看得出中国今后是一个谋求霸道的国家还是一个奉行王道的国家。研究中国周边外交实际上就是抓住了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整个中国外交的灵魂。

我们的周边外交还处在起步阶段、初级阶段，也就是逐步提出构想、着手开始实施的阶段。周边外交的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边想边干、边干边学、边学边提高的过程。目前可以看到，中国很多好的构想还没有实施，或者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没有来得及对细节进行推敲，因为中国的力量和地位提升得太快，就像一个青少年，身体长得很快，脑力可能还没有跟上，社会经验和阅历还没有跟上。学者就要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周边外交不断进行评估、总结，提出改进的意见。

周边安全战略的最终目的

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怎样弥补周边的安全短板。周边外交能不能真正取得成果，很大程度上要看周边安全的短板怎样弥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周边安全的理念、周边安全战略的设计、具体的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周边安全理念上，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过新安全观，当时更多的是结合冷战结束以及东亚地区安全合作的开展提出我们的一些想法，主要还是一种适应性调整。现在我们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更多的是考虑在中国力量和地位上升的形势下如何处理面临的周边安全挑战，具有主动性和塑造性。目前提出的新安全观与上世纪90年代的新安全观相比，更有包容性、针对性、时代性。

在周边安全战略上，我认为今后的战略统筹可能是放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大战略上。“一带一路”似乎不是一个安全设计，而是一个发展设计。这可能就是我们新的安全战略的高明之处，也就是说，“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这个地区的基本逻辑是发展，其安全设计就不能是付诸军事，而是付诸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这就抓住了这一地区问题的本质和核心，应该说这样的设计是比较得当的。

周边安全政策和举措的关键是要能够解决问题。这对中国是一个考验，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比如朝鲜问题、阿富汗问题，还有这几年一直反复的东海问题、南海问题，还有周边国家的内部政治和社会冲突问题。中国有无可能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发挥适当作用？即使理念得体、战略得当，但如果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还是不行。

所以，怎样在这三个层次上解决我们面临的安全挑战，塑造一个比较好的安全环境，建立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由此确立中国在地区安全、地区战略中的主导地位，这应该就是周边安全战略最终要达到的目的。

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础

我认为，对中国外交的研究要注重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周边人脉工程建设。外交是靠人来实施的，生意也是靠人去做的。不管对方国内政治如何变动，我们跟它们的合作项目都必须继续推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14年5月20日，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上，中国海军队列整齐，威武雄壮。

图片来源/Imaginechina

进，这就要靠长期的人脉积累。这是中国今后要花大力气去解决的问题。

二是周边安全机制的建设。不要忘记，安全是我们的短板。这个短板不解决，周边国家对我们的疑虑不解决，美国对我们的要挟就会继续下去。所以，我们需要在周边根据新的安全挑战、根据亚洲的安全文化以及国家之间安全关系的现状，来设计一些功能化的、问题导向的安全合作机制。我们现在讲的亚洲安全架构不是一个单一的、涵盖一切的东西。它应该是一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安全安排，整体上构成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对此，我们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思考。

三是地区经贸合作新机制的建设。地区经济合作从贸易开始，到金融领域，再到互联互通，今后是否可能建立一种新的平台？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出一些新的设想，走出新的路子，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搭建不同的合作平台。

四是对“一带一路”的谋划。“一带一路”的基本构想已经做出，但在细节上有很多问题，包括经贸合作的规划、基础设施的建设、金融和融资的保证，还有相关国家政治社会风险的规避，等等。今后要做更加具体、更加精细化的分析。

五是周边外交的轻重缓急。中国的周边国家有几十个，“一带一路”也涉及几十个国家。哪些国家重点是经济合作，哪些国家重点是安全合作，哪些国家是首先改善政治关系，等等，要有轻重缓急的考虑，不可能面面俱到。

六是周边国家的反应。我们的周边外交大手笔出来以后，周边国家怎么看？它们有什么样的担心，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必须更多地走出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去做调研，真正了解那些国家，考虑它们的关切、它们的需要。

最后是周边外交的国内依托，包括国内资源的投入，国内横向、纵向的协调以及机制的支撑。高层可能已经意识到并且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不但涉及中央各部委，而且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跟地方的相互协调等。这个问题对我们提出了体制调整和体制创新方面的挑战。

总体上，我认为中国的周边外交能不能成功，决定着中国能不能真正地实现崛起。我们不是靠与别国结盟来实现崛起，而是要与周边形成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来实现这一目标，所以我们的周边首先要被打造成发展的新平台，其次要形成利益融合的新形态，第三要形成合作的新格局，最后形成我国安全的新屏障和战略的新依托。有了这样一个格局，中国的崛起就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